

新会县文史资料选辑

· 第八辑 ·

非卖品 请交换

新会县政协文史组编印

封面设计 黄 蕾

一九八二年十月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目 录

- 关于大革命时期前后江门、新会党组织工作
情况的回忆材料……………叶季壮(遗稿)(1)
- 抗战前新会县立教师罢教索薪记述
……………李达生(5)
- 回忆新会县社训总队及模范队
……………王国生(12)
- ✓《新会战报》的始终……………钟 华(15)
- 抗战初期敌机七次空袭会城纪实
……………伦海滨(24)
- 回忆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挺进敌区坚
持斗争的情况……………谢 悦(28)
- 江会沦陷后对日军几次战斗……………余梓梁(37)
- 抗战期间的第四战区政治部……………何坤巽(44)
- “盗卖试题案”的前后……………伦海滨(59)
- 新会城街名考……………朝 练
- 贤洲路……………(11)
- 百岁路……………(23)

关于大革命时期前后 江门、新会党组织工作情况的回忆材料

叶季壮

一、江门、新会党组织的情况

江门支部成立时，我尚未到江门做党的工作。我是在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去江门的。记得当时听说江会支部是在一九二四年成立的。我到江门时，当时江会支部的负责人是陈日光。大约是一九二六年秋，江会支部分为两个支部：江门支部和新会支部。我任江门支部书记，陈日光任新会支部书记。

二、江门、新会党组织的一些活动

我在江门的时候，记得没有开过代表大会，因为当时党员很少，只开支部大会。开会地点一般是在江门的新会总工会，有时也在新会城里的新会总工会办事处（当时新会总工会设在江门，新会城里设总工会办事处。）

讨论的问题，主要有：

1. 江门工人运动问题：当时江门工运分两派，受党领导的总工会是一派，江门工人代表会是另一派，它不愿接受江门党的领导，但也不反动。当时会长叶章，此人也不是反动的，他到广州后还接受广州工人代表会的领导（广州工人代表会当时是受党领导的），我记得他在国民党清党以后，似乎也还没有反动。但是当时这两派的问题总未解决。现在

看来是我们领导上有缺点，有些关门倾向和宗派情绪，没有团结好。

2. 农会和农运问题：主要是组织农民自卫军问题，但当时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富农，走了富农路线。国民党反动后，很快就解体了，以致广州暴动时也动员不起来。

3. 改组国民党，是成功的。我们把江门市国民党党部抓过来了，我做了党部的负责人，国民党左派人士都听我们的话；党委之一——钟毓奇是左派，清党后他就去教书，也没有反共。

4. 发展党组织。记得当时党员有：陈日光、李绍勤、李冠南、周华、李安、王坚淮（这些人以后情况不明）；苏钧松（后调省委工作，在香港病死）；张文照、文卓英（当时是工人，后来也下落不明）；王（黄）袞华、吕（惠）蕓（注：她是共青团员）（被国民党逮捕牺牲）；吕荣（消极，跑到澳门，被匪后解到广州被杀）；施展、张培道（脱党后去海外，现在广州工作）；尹国彦（在缅甸当华侨资本家）；邓合（鹤）琴（叛变后逃往香港）；陈谷琴（叛徒，解放时在上海海关给我来过一封信，我请华东同志调查，后来也跑到香港去了）。

在江会支部合并时和分开后讨论的大体上就是这些问题。

三、对于江门市国民党的改组，当时有斗争，但很快就解决了。主要是依靠工会的支持，很快把市党部抓过来了。下面的三个国民党区党部，只有一个工商联（包括一部分职员）的区党部；我们对国民党的右派梁爱（醒）民让了步，由他负责，并接受我们的领导；其余两个区党部都受我们的掌握。

四、领导当地工农群众进行斗争的一些情况

在大革命未失败前，在江门市主要搞工会工作，组织增加工资的斗争，一般还顺利。因为当时国民党在江门力量薄弱，而我们力量占绝对优势。同时我们掌握了国民党党部，以国民党名义作工作。又由于我本人过去在江门和新会做过多年工作，利用个人一点影响，团结了无党派的人士，统战工作较好。因此，当时我们党在江门的领导工作是坚强的，国民党有派无法对我们挑起政治纠纷。在农村就比较复杂，同土豪劣绅斗争很激烈。当时党在农村的力量，农会和农民自卫军虽然也逐渐扩大，但因走了富农路线，实际上是以新豪绅代替旧豪绅，没有认真发动农民群众，所以国民党反动后，我们的工作一下子就垮了。

五、一九二七年五月国民党反动以后，国民党清党，当时绝大部分同志都跑了，包括新会支部的负责人陈目光在内。只有江门支部留下几个人。记得有张文照、王（黄）袞华、王坚淮、李安、周华、吕璇（旋）和我。当时我们把机关搬到江门过河的滘头乡，派李安去港澳同省委联络，派张文照作内地交通，周华搞船艇工会，王坚淮去各乡，派王（黄）袞华、吕璇（旋）到新会工作（因新会支部已垮了），当时主要工作是去找失了联络的同志恢复党的组织。另有一些人，如吕棠、文卓英、张培道、施展等则跑到港澳，具体情况不清楚，好似同党还有联系。

到一九二七年十月左右，组织上成立五邑地委，管新会（包括江门）、台山、鹤山、恩平、开平五县，我任地委书记，李安、王坚淮是委员，还有其他人已不清楚。当时曾经往各县联络，记得王坚淮曾派到恩平去，因那里他有熟人。

为了配合广州暴动，省委曾决定成立五邑暴动指挥部，

并决定由地委负责领导。但我们接到省委的通知时，广州暴动已经失败。接到通知之时，省委也派来一些人，其中有张培道。当时由李安传达省委指示。我们决定搞江门、恩平的暴动。江门开了群众大会，在新会和恩平农村也开了会，农村集合了少数自卫军，敌人有些紧张，但因广暴已经失败，自卫军也散了，很快便垮了。省委来的人就回了香港。王（黄）袞华、吕（惠）璇当时被捕牺牲。敌人在新会、江门和农村也捕了一些非党群众，人数不多。

从大革命失败到广州暴动之间，我们还准备过接应南昌起义，因当时起义的军队往广东撤退。在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我接到省委通知到澳门开会，讨论如何接应南昌起义，但到澳门后知道起义部队已在揭阳一带失败，就停止了这项工作的讨论。

六、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组织上因我已公开暴露面目，在新会、江门工作有困难，决定调我到广东省委另行分配工作，把五邑地委工作交给李安，并把机关移到船艇中，是流动的。我到香港后，听说后来李安又另调工作，而接替李安工作的人是叛徒，于是组织受到了大破坏，但详情不大清楚。

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日

附记：

新会县修志会五九年十二月油印本《江会地区大革命史略》送叶季壮同志审阅后，他于一九六〇年来信指出其中有某些差错，提出指正。最近，县修志组将叶部长《关于大革命时期前后，江门、新会党组织工作情况的回忆材料》供给本刊刊登。

抗战前新会县立教师罢教索薪记述

李达生

一、陈济棠时代新会教师的悲惨情景

一九三六年，广东在陈济棠的统治下，曾被人称为“黄金时代”，就在那个时期是新会教师灾难之年，堂堂的富饶大邑，却长期闹欠薪达七个月之久。中学教师多是外地聘请来的，学期结束了，有的旅费还未有而不能回家，有的变卖书籍杂物维持生活。一位县立短期小学校长，在申请县府清发欠薪的呈文中写道“……典当已尽，妻啼饥而儿号寒”，说出当时的悲惨景象。城市教师是这样，农村教师也不好过，亦受到欠薪的痛苦。一位教师早上在升旗礼中，将一个黑瓦礫扯上旗杆顶来表示沉痛的抗议，一群小学生怎能理解“吊罉”是什么的滋味呢？

一九三六年夏季，江会两地的县立中小学，同时收到邮局送来的油印通知，定期在象山茶室开会，商议索薪问题，要求派代表依时参加，这通知是谁发出，当时还未有人知道，却有人走漏风声，为县长黄槐庭发觉，马上先发制人，召集各校长到县府训话，责令校长们要劝导教师不要受人利用，要安心教书，等候政府解决欠薪，校长们为了保住乌纱帽，返校再三阻止教师不要组织请愿行动。刚刚酝酿着的请愿就被扼杀了。

事后据知情者透露，发出油印通知是由县立一小的教师秘密进行的，准备发动一次请愿，要求清发欠薪，计划用圆形方式签名（这样不会被人发现谁是为首的发起人），一小校长谭汝钧知道情况，他考虑可能引起风险，即嘱咐他的同事说：“记得要寄一份给我校，以备日后追查时，我校有得缴验，免受怀疑”。是否他向县政府告密不清楚。

与教师欠薪的同时，县兵营的士兵也欠军饷，欠发时间还没有教师这样长，但很快就得解决。闻黄槐庭曾对人说：“这群丘八有枪，闹起来不好办，那班教师得把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要理他们”。教师们听到这话无比愤怒，想不到为人师表者连丘八都不如。这就是广东“黄金时代”新会教师地位和生活的写照了。黄槐庭这个名中医黄焯南的儿子，凭借他和南天王陈济棠的文胆林翼中的特殊关系，任新会县长连续四年多，是民国以来历任县长在职最长的一个，也是广东全省县长政绩考试第一名的人物，成绩是60分。（当时广州出版的中山，越华，国华和地方报纸都有这段新闻的报导）。积欠教育经费，是他最显著的“德政”了。他平日混迹洋场，征歌选色，对人民的疾苦必然置诸脑后，把持国库，肆意挥霍，于是教育经费就不按月支发，初时只是稍为拖欠，如一月份经费拖到二月底，二月份又拖至四月份，后来月底发三月份经费，七月初才发下四月份的经费，这样下去，到36年便积欠达七个月了。

二、从停课请愿到罢教索薪

三六年七八月，两广“还政中央”，陈济棠下野，黄槐庭也于九月初倒台了。省府任命李务滋接长新会。旧任一走了

事，新任对欠薪怎样解决，是教师们最关心的问题。由县立二中（设在江门即现市一中）发函各校，邀请派代表到会城东门火车站茗园茶室会议，研究有关清发欠薪问题，时间约在开学后九月下旬，各校都积极响应选派代表参加，计有县立一中黄朝班，二中区锡泉，师范赵仲渭，一小刘仲儒，二小何耀焜，三小赵楚湘，四小李华焕，五小区舜南，六小黄汉雄，七小谭醴泉，八小梁华灼，九小李秉东，十小李达生。会议结果，成立清发欠薪委员会，推选区锡泉、黄朝班、赵仲渭为正副主任委员，其他代表为委员。并决定：①对外联络交涉事宜由正副主任为全权代表；②每星期六下午一时在东门茗园茶室开会，听取有关交涉情况及研究进行步骤（有特殊情况另行通知）；③委员会活动经费先由三间中学垫支，将来按各校教师人数比例在清发欠薪中扣偿。

经过几次会议，听取向县长李务滋，秘书张镜黎，教育局局长吴伯端，财政局长蔡弼侯等人交涉经过，得到的答复是一套官腔，认为政府欠教育经费，不论谁当县长，都应清还，但前任积欠款项太多，地方财政收入不敷开支，教育经费一时不能解决，希望教师们耐心等待，政府是会设法清发的（大意是这样）。代表们认为没有切实答复，决定先来一次停课请愿，若再不解决实行罢教索薪。

约在十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江会两地的县立中小学教师有百多人（没有校长参加），分别到江门仓后路新会县党部礼堂集中，由区锡泉等人向县党部说明来意，要求县党部支持教师的正当要求。县党部特派员李淞甫和秘书张荣健在二楼接见代表，并在礼堂和全体教师见面。然后列队经常安、莲平、兴宁等马路，直达水南石湾村——新会县政府所在地。这群穿西装、长衫、中山装的斯文人队伍，引动不少行

人的注目，用奇异的眼光询问相识的教师，才知道老师们去县府请愿，要求清发欠薪的事。

抵达县府，挤满了小小的礼堂，经过区锡泉等人的道达来意后，秘书张镜黎接见，后李务滋出来和全体教师见面，并讲了话，大意是对教师的处境表示同情，讲出目前财政困难，前任欠款太多，一时未能解决教育经费，停课也迫不出办法来，劝导大家回校上课，等候政府设法解决，有意见交代表转达等等。各人听完也就返回县党部礼堂开会。请愿不会有结果，是意料中的，这不过是先礼后兵的手段。会上经过热烈争论，最后决定实行罢教索薪的统一行动。由黄朝班等人草拟罢教宣言及告民众书，区锡泉等召开记者招待会，争取新闻界的支持，并由各委员组成检查小组，分别到各校检查罢教执行情况。一切筹备就绪之后，在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一次轰动全广东的新会县立中小学教师罢教索薪的行动开始了。当天早上江会出版的民权，新商，民国，民众四家报纸，和下午到达的广州中山、国华、越华、香港星岛、工商、华侨等报纸，都有新会教师罢教的新闻报导。有的采大标题，有的发表评论，支援教师的正义行动，呼吁政府早日解决欠薪。报童们在茶楼酒馆大声叫卖。罢教索薪，成为人们议论和关心的社会大事。

各校学生当天仍照常回校，由值日教师宣读罢教委员会的通知，分发罢教宣言，中学生则随即离校，小学生多数回教室自修，值日导师巡堂管理，个别小学还继续上课，当检查小组到校时，教师才离开课室。

罢教的统一行动，确是震动了县府老爷们，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在“两广还政中央”后发生这样的事，既羞且怒，县长李务滋即召集中小校长到县府训话，要校长劝导教师迅

速复教，又指示财政局和教费管委会拟出具体办法清发欠薪；提出将江门中山公园后广场空地拍卖，还另外在地方财政收入项下划拨部分清发积欠，同时召见区锡泉等人，将解决办法提出协商，要求教师早日复教，维持教学秩序。

三、团结斗争完满索还欠薪

新会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简称教费管委会），是在县府属下筹划管理教育经费的机构，由财政局、教育局和地方殷商士绅，部分校长等人组成，主任委员是教育局长吴伯端兼，副主任委员是杨惠波（江门新亚酒店经理），莫朝雄（十小校长），该会于开学时曾通知各校，将学费收入暂不上缴，留作清发欠薪，先解决部份困难，因此各校情况互有差别，学生人数多收入学费多，欠薪就少，反之学生少学费少，欠薪就多。据当时了解欠薪最多的有六七个月，最少的只三两个月，所以对待罢教索薪态度上未能一致。从地区上江门教师较积极坚决，以二中为代表，外地教师多，会城教师表现得消极动摇，师范学校是代表，多数是本县人。在委员会和全体教师大会上常发生争论，有人认为罢教索薪在广东的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成功了，每人不过得回积欠的工资，失败了不仅个人有危险，还牵连家属亲人，不比外地人一走了事，应慎重考虑，不要轻举妄动。大多数人认为知识分子的动摇软弱被人看穿，所以黄槐庭才怕丘八而轻视丘九，政府是欺软怕硬的，就要团结起来，行动一致，况且广东“还政中央”不久，为了笼络人心，不会轻易抓人，实行罢教会促使政府早日解决问题，再迟疑不决，就会失去良机，欠薪问题不知拖到何时了。经过辩论最后才把广大教师

的思想统一在罢教索薪的行动上来。十天的罢教行动，迫使政府作出具体答复，而各校态度上有距离，情况有变化，乃统一复教，静候解决。

学校上课了，斗争还在继续，区锡泉经常到县政府向教育局，财政局、教费管委会探听拍卖情况，反复磋商研究，得知拍卖中山公园后广场空地，可以清发积欠八成。委员会研究讨论，征求意见。据各校反映，认为新任替旧任还债，实属难得，同意接受八成的办法，但要求在学期结束前清发。又经过反复交涉催促，一九三七年春节前领回欠薪八成，由原来的省毫券以一四四比一折合大洋券发给。

当教师们领到欠薪时，一时产生“中央政府”比“西南政府”好的感觉，也对李务滋产生好感，被他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军人做事率直爽快，不像黄槐庭官僚政客的狡猾奸诈，把李务滋当成好的“父母官”。对区锡泉领导这场斗争日夜操劳，大胆果断，不怕困难，不畏强暴的精神，在教师中留下深刻印象。县府的人说老区这个人很难搞，是个危险人物，有人传说他是个“老八”，但没有根据，于是后来他被李务滋扣留，不知因什么事。

到一九三七年夏天，县府又通知补发旧欠二成，大家是料想不到喜出望外的事，有人倡议将这二成款捐献，用来在圭峰山建塔纪念，并举行叙餐等费用，大家同意交由教费管委会筹办这事。在秋季开学后的一个星期天，李务滋、吴伯端及各校长和全体教师登上圭峰，参加纪念塔建成揭幕摄影留念，并聚餐联欢。

这个纪念塔是六角形，没有名称和碑文，现在仍在圭峰山左麓白沙讲学亭左下侧，当时有人拟撰写碑文歌颂李务滋为解决积欠教育经费的德政，多数人认为这是教师团结斗争

的胜利，碑文应记述团结罢教索薪的史实，因此思想分歧很大，迟迟未能决定。不久抗战爆发，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事了，经过几十年的变迁，也更少人知道这个塔的来历了。

从清发欠薪事实来看，李务滋是比黄槐庭好，而李务滋实有不能不负起解决的苦衷，一来要维持“中央政府”的体面，二来怕问题扩大会影响自己乌纱帽。而黄槐庭敢于拖欠，他也看到“西南政府”会垮台的“改朝换代”局面，若是一般的县长更换，手续不清，新任可向上级控告，黄槐庭不能溜之大吉的，可是仅十年多时间，他居然成了新会民意机关的代表者——新会县参议会的议长了，这就是旧中国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表现。

· 新会城街名考 ·

百 岁 路

朝 练

百岁路，土名叫做东亭洲。明朝万历四年（公元一五七六年）邑人为纪念义士陈元琛而建立的牌坊，命名为百岁坊，后人把这条街也称做百岁坊。1933年修筑马路，牌坊当然要拆去，街名也随着改为百岁路。

建立牌坊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明朝嘉靖二年（公元一五二三年），古兜山土匪横行无忌，各乡人民深受其害，布政（管理全省民政和财政的官吏）章拯计划派军队进剿。双水人陈元琛以老百姓身分上书献策，还倾家荡产招集乡兵前往助战，结果获得奇功。不料官兵在胜利后，竟诬陷附乡古井长沙乡民附匪通匪，要全部杀戮。陈元琛当时竭力反对，乡民才未遭殃。邑人深深感谢他的恩惠，当他逝世时特立百岁坊文在长沙修建祠堂作为永久纪念。

回忆新会县社训总队及模范队

王国生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江、会吃紧，当时国民党政府欺骗群众，表面上组织军事和准军事机构，以示政府组织全民抗战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新会县社会军事训练总队（以下简称社训总队）便于一九三八年成立，统管县属的三个国民兵中队（又叫兵队）。总队长由县长李务滋兼任，副总队长林新（中校），鹤山县人，年约五十岁。同年冬，新会县社训总队招考模范队第一期学员，训练期为半年，毕业后派出各乡公所任少尉乡队附，负责训练本乡适龄壮丁。当时，我跟一班满腔热忱，不愿做亡国奴的18—22岁的男女青年及学生二百多人参加考试，我和另外一百二十人左右都被取录，队址设在风采堂（即现在一中学校的风采堂），训练内容是基本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以及兵器、战术等。模范队的主任由林新兼任，下设正副队长各一人。三个区队，各有正副队长，其中一个少尉区队附叫李如柏。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我们模范队行将结业，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侵入江门，消息传来，人心惶惶。当时国民党军队及政府并无抵抗意图，县政府且已搬至双水天亭办公。留下社训队一个县兵队和模范队学员，到危急时才撤退。那时县兵队只有七、八十人，配有七九步枪、驳壳手枪、手榴弹等武器，模范队则有百人左右，只有几十条破烂七九和套筒步枪，根本

没有什么战斗力。

几天后，日本侵略军由江门向会城入侵，模范队接到的命令是：晨九时开饭，饭后待命出发。午后，东门方向枪炮声大作。随即模范队在前，县兵队断后，出北门，沿山路向卖茶寮方向撤退。撤退至北门菜地（即今县粤剧团附近）时，被日本军双翼飞机俯冲扫射，当时我和一些学员，不少人背着红色金山毡，卷成长条，右肩左腋行进。为避免暴露目标，又被另一些学员喝令掩蔽。在敌机俯冲的紧急时刻，只好把仅有的一条金山毡忍痛地抛弃了。一百多人分成十多个小分队，各自找荫蔽的小路分散跃进，等敌机过后，队伍才逐渐聚集，又沿着大泽同和附近的山路前进。傍晚时分到达大泽见龙里口的祠堂住下，幸未发生伤亡事故。当晚由于敌机空袭，不少人丢掉背包、毛毡、棉被等物品，只得睡在稻草上。有些学员苦笑着说，今晚叫做“金菜蒸鲛鱼”。

从风采堂出发，直到离开会城止，部队始终没有放一枪一弹。名为撤退，实际可以说是“狼狈逃遁”。事后得知，当社训总队这一百多人离开北门进入山区后，日本军就从东门长驱进入会城，根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国民党的所谓全面抗战，于此可见一斑。

次日，队伍由大泽见龙里出发，沿山区小路（不敢走大路）向罗坑天湖集中，也是模范队在前，县兵队断后，途中闻后边较远处有枪声，我们不敢滞留，加快速度前进，日寇压境，我们到达天湖，还未展开救亡工作，而我们的林副总队长到达天湖后，却与女学员 沅 慧 仪（不足二十岁）结婚（先奸后娶）。当时学员议论纷纷，但没人敢公开提出批评。后来县兵队有一个“大老粗”少尉排长，因事与林顶起牛来，拔出手枪，声称与林拼命。结果，林对这个排长不但

无可奈何，反而表扬他敢勇爽直。从这一事例，可以想见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试问这样的军队，怎能担当得起抗日救亡的重任？

队伍在天湖休息了十多天，模范队就宣告结业了，学员大部分分到县府控制区的各乡去工作，我被分配到双水东凌冲乡（乡公所设在双水墟）任少尉乡队附。乡长（兼乡队长）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忘其姓名）。我们背后叫他做“鳅鱼头”，他只跟我谈过几句话说是“现在国难当头，经费无着，工作不好开展，你先住下来，以后看情况再谈”。如此过了将近两个月，天天都是游手好闲，又没有发过一分钱薪水，随身只有一套破军衣和一件汗衣，晚上洗了白天穿，真是又穷又酸，身上连饮凉茶的钱都没有。有一次，邻乡一位女同学林慧冰来探望我，我请她上茶楼饮茶，吃了毫券二角多钱，到结算时我和她争着付钱，其实我当时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她和我处境一样糟，加上她是个女孩子，流落异乡，有家归不得。谈起来声泪俱下。我们就串连了黄振勋、黄伟光（均杜阮人）、谢淑梧等几位同学，到黄伟光在云浮西山第四区署当区长的堂兄那里去谋出路。

这篇回忆到此似应结束了，以后，蒋管区的社训总队改为国民兵团，我想新会自然也不例外。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模范队的学员，像我这样当了一个多月甚至更长间的乡队附，连一分钱薪饷也没有拿到的决不是个别现象，至少，我们上述的五个人都是如此。这就是我们满腔热血参加全民抗战的实际遭遇。

1982年4月12日于骨折治疗中

《新会战报》的始终

钟 华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广东中区抗战前哨新会临时县治天亭圩，出现一份四开四版半周刊的铅印小报——《新会战报》。它是由中共新会江南区工委直接领导掌握，以国民党新会县政府名义发行的一份地方小报。这份小报，在十分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三个多月，最后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扼杀。它虽然生命短促，但作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斗争的一段经历和抗战初期粤中区的一页报业史，是值得回顾的。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日寇继占广州之后，又西进攻陷了江门镇和新会县城。战时新会县治的天亭，虽然与日寇占领区前哨仅距几公里，但它前隔银洲湖，后枕将军山，在日寇兵力不足无法占领更多农村的情况下，仍可暂时求得偏安。由于国民党粤中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已经移驻于开平长沙，因而对新会这个半沦陷区的控制稍较松懈。另一方面，中共新会地下党的组织活动，经过江会沦陷前两年的发展，特别是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其他青年救亡团体的活动，发展和培养的党员骨干，已分布在驻新会一带的地方武装部